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5 冊

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

余志挺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余志挺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2+210 面；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第 15 冊）

ISBN：978-986-6657-13-9（精裝）

1. 三國志 2. 研究考訂

622.301

97000920

ISBN - 978-986-6657-13-9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 編 第十五冊

ISBN：978-986-6657-13-9

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

作 者 余志挺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3 月

定 價 六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

余志挺 著

作者簡介

余志挺，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生，肖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

儒家思想、道家氣度、墨家生活。

學術研究深受尤雅姿老師、林安梧老師、林祐乾老師影響；家庭氛圍則因有愛妻張齡文與愛女余芝晴的支持而倍感幸福。

曾發表〈阮籍文學中「象徵」修辭格的運用與意涵〉（《東方人文學誌》第一卷第一期）、〈從死亡體會阮籍的儒道衝突〉（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第九屆學術研討會）、〈王陽明的生死念頭與相關議題〉（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第九屆學術研討會）、〈未盡的名媛～從魏晉賢媛到現代名媛〉（翰林《文苑天地》第三十五期）、〈盡道而死的孟子命觀〉（龍騰《國文新天地》第十五期）、〈臺灣文學的遞變〉（翰林《文苑天地》第四十一期）等單篇論文。

提 要

世之談「三國」者，莫不以其戰局詭譎、英雄輩出而津津樂道，關雲長「忠義」形象、諸葛孔明「智謀」風範、曹孟德「奸巧」樣貌，一皆歷歷如繪、千古傳誦，成為根深柢固的題材象徵，然此實多受羅貫中《三國演義》影響，《三國演義》者，「小說」之類也，班固《漢書·藝文志》嘗言「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可知小說產生，必有不少虛妄不實、加油添醋的成分，且《三國演義》原名《三國志通俗演義》，意指本在陳壽《三國志》的基礎下為通俗大眾做延伸演繹，故為創造精采情節以期能受閱者、聽者青睞，而平添許多聳動、誇張、刻意、矯飾等內容，距離史實，似又遠矣。

是以，欲全盤準確掌握動人卻混亂的三國史實，必回歸陳壽《三國志》，明其內容，方能知當時之發展。《三國志》在陳壽撰寫之前，已有草稿，王沈《魏書》、魚豢《魏略》、韋昭《吳書》說明魏、吳當時已有「史」，蜀仍無史，故陳壽自行採輯，僅得十五卷，《三國志》乃私修斷化分國史，原是《魏國志》、《蜀國志》、《吳國志》三書單獨流傳，至北宋咸平六年已合為一書，陳壽因「年號接續」和「擔任西晉著作郎」考量，而以魏為正統，體裁雖猶屬「正史體」，然寫作方式又異於司馬遷《史記》的「通史」，以及班固《漢書》的「斷代」，緊扣著三國時代可分可合的特性，開創出「紀傳體」的新面貌。

然《三國志》「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故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補注，博采群說，分入書中」，裴松之奉詔後，廣徵書目達二百餘部，以對《三國志》進行「補闕」與「備異」，又仿《史記》「太史公曰」形式，或裴氏自注，或引用孫盛、何休等十四名家評論，以「懲妄」、「論辯」《三國志》謬誤處，體例可謂精矣！注成之後，其篇幅甚至直逼陳壽《三國志》，遂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認定裴松之《三國志注》「多過本書數倍」的說法，故此重以鼎文書局所出版之新校標點本《三國志》，分別針對陳壽原書與裴松之注文逐字計數，統計得出每卷與全書總計字數，從而求得兩者間互輔互助之正確關聯。並逐卷分點出裴氏注文之參考書目，藉以呈現當時卷籍繁類之盛，和裴氏研究心力之廣，期許在此腳踏實地之研究下，還原三國時代真實樣貌，並破除羅貫中《三國演義》迷思，給予陳壽《三國志》與裴松之《三國志注》應有的史學高度。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步驟與範疇	4
第二章 《三國志注》的作者	11
第一節 裴松之的生平	11
第二節 裴松之的著作	15
第三章 《三國志注》的成書	21
第一節 《三國志注》的撰作始末	21
第二節 《三國志注》的編寫篇幅	24
第四章 《三國志注》體例研究	33
第一節 補陳壽原書的缺佚	33
第二節 辨陳壽原書的訛疑	45
第五章 《三國志注》引書研究	53
第一節 《三國志注》引書考述	53
第二節 《三國志注》引書索引	93
第六章 《三國志注》史評研究	121
第一節 自注呈現的面向	121
第二節 議論諸家的型態	142
第七章 《三國志注》的價值與影響	177
第一節 《三國志注》的價值	177
第二節 《三國志注》的影響	187
第八章 結 論	197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20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三國志》，陳壽撰，最初成書為《魏國志》三十卷、《蜀國志》十五卷，及《吳國志》二十一卷三部，雖言「三國」，實非僅為一書，這與當時的歷史狀況十分切合，因為東漢王朝由統一走向分裂，而後形成魏、蜀、吳三個國家，成為中國境內同時出現的鼎立政權，雖然分裂為三，合起來稱「三國」亦足以代表當時歷史的政治局面，故化為文獻，《三國志》一書也具有可分、可合的特點，《隋書》雖著錄「《三國志》六十五卷」〔註1〕，其下亦載有「《魏志音義》一卷」〔註2〕，可見魏、蜀、吳三書可以單獨分行，《舊唐書》與《新唐書》則把《魏國志》、《蜀國志》、《吳國志》分開著錄〔註3〕，到了北宋，魏、蜀、吳三書才真正合併起來，刻印成一書，統稱為《三國志》。

《三國志》作者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省南充市）人，生於三國蜀漢後主建興十一年（233），卒於西晉惠帝元康七年（297），歲六十五，晉武帝

〔註1〕 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二》魏徵等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4年3月初版），頁955。

〔註2〕 同前註。

〔註3〕 《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上》：「《魏國志》三十卷，陳壽撰，裴松之注。」劉昫等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10月初版），頁1989；又有「《蜀國志》十五卷，陳壽撰。」及「《吳國志》二十一卷，陳壽撰，裴松之注。」的記載，註同前，頁1992；另外，《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陳壽《魏國志》三十卷、《蜀國志》十五卷、《吳國志》二十一卷，並裴松之注。」歐陽詢、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10月初版），頁1455；由此可知《舊唐書》與《新唐書》都是把魏、蜀、吳三書分開著錄的。

太康元年（280），司馬炎命王濬攻吳，下建業、孫皓降，晉策封其為「歸命侯」，三國鼎立的局面至此終告結束，中國復歸統一，陳壽於時開始撰寫魏、蜀、吳三國志，書成，「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註4）。

不過，陳壽撰寫《三國志》因當時所見材料有限，導致內容過於簡略，故裴松之奉宋文帝劉義隆詔命，在陳壽死後一百三十二年為《三國志》作注，並於宋文帝元嘉六年（429）七月二十四日注成。

裴松之《三國志注》出，不僅彌補了陳壽《三國志》簡略之弊，其徵引材料的豐富程度、史學評論的精闢見解、對史書人物的辨析品議，在保存魏晉史料、總結魏晉史學、開創新的史論方式，以及對後世三國歷史延伸的文學、史學、兵學、戲劇等領域，均有莫大貢獻，不過，元、明之際，太原羅貫中始撰《三國志演義》，大致因襲元代至治間，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國志平話》關目，從原本短短的三卷，擴充到二十四卷，又參考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三國志注》的正史內容，加以刪補，將平話本中的簡陋處增飾、渲染，並利用文人之筆描繪詳盡，製造引人入勝的氣氛，因此書成以後，不僅與平話本的內容差異頗大，且迅即風靡，甚至連陳壽《三國志》亦漸受冷落。

以淺近文言文寫成的《三國志演義》，儘管撰作不免受到史實的束縛，可是演義小說畢竟仍屬小說範疇，只是依據陳壽《三國志》為底本的小說演述而已，故於演義之餘，為求情節高潮迭起，或有失真、失實，且壽書、裴注，在羅貫中《三國志演義》通行於世之際，不但沒有大行其道，還被《三國志演義》取代一般人對三國歷史的理解，甚至猶有以為《三國志演義》中的記載，才是真正的三國史實，其深植人心如此，反倒模糊了陳壽《三國志》、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功能，同時也錯誤認識了三國紛亂的史實。

因此，研究三國史必先歸返陳壽《三國志》，而為克服陳壽《三國志》的簡略，又須聚焦於裴松之《三國志注》，此即以裴松之《三國志注》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企圖追尋裴松之於增補陳壽《三國志》的同時，延伸出來的作注方法、撰作目的，並藉由其與陳壽《三國志》及徵引材料間的比較、辨異，深究裴松之在處理材料和相關記載時，所致力開創的史學識見。

裴松之注陳壽《三國志》，增添其不足、考訂其爭議、更正其謬誤，對《三國志》原書與三國歷史的重新建構，具有更趨完整的決定性影響，重要的程度不只欲研究

〔註4〕見《晉書·卷八十二·陳壽傳》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9年8月三版），頁2137。

《三國志》勢將同時參照裴松之注，甚至要探討三國史實、史料等學術領域，也必然無法忽略《三國志注》較陳壽原書更為詳盡、豐富的資料。

以目前研究裴松之《三國志注》的方向而言，大致可區分為「裴松之本人」、「《三國志注》本書」，以及「裴松之《三國志注》整體研究」三個部分。

單就「裴松之本人」為研究對象者，前僅有蔡瑄瑾發表於民國 84 年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餘則散見史學家評傳之類的著作。

而以「《三國志注》本書」為研究對象者，多是切割《三國志注》其中一部份的內容進行探討，例如「字數統計」、「引用書目」等。

關於《三國志》本文、注文的字數統計，最早有王庭洽在《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3 年第四期上發表〈應正確認識三國志裴注的價值〉，和刊載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 年第三期的〈略談三國志與裴注的數量問題〉兩篇論文進行研究，接著又有崔曙庭〈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注〉發表於《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 年第二期，以及黃大受〈三國志及裴注之研究〉一文，分別逐字算數，得出詳實的統計結果。

至於《三國志注》的引用書目，清代時即有錢大昕《廿二史攷異》、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趙翼《廿二史劄記》、趙紹祖《讀書偶記》，以及沈家本古書目四種之一《三國志裴注所引書目》對此進行整理，民國以後則有王祖彝《三國志裴注引用書目》、王念祖《三國志裴注引書目》二部著作，與王鍾翰發表於《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五卷的〈三國志裴注考證〉，接續編輯的工作，不過，因為依據方法和分類角度的不同，所以也產生程度不一的謬誤與遺漏，故仍須回歸裴松之《三國志注》，重新安排所引書目，以求完備。

在整體的研究，即「裴松之及其《三國志注》」方面，歷來有楊翼驥〈裴松之與三國志注〉、黃大受〈三國志及裴注之研究〉與〈三國志注與裴松之〉、遼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研究〉和〈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雜傳集釋〉及〈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等單篇論文，著作方面則多見於「中國史學史」、「史書評介」、「史學論集」等類的書籍，其中以遼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所述最為完備，而其他眾家記載的優劣，亦散及各章節以茲參照。

除針對裴松之《三國志注》本身的探討外，亦同時兼及有關三國史，或《三國志》的研究論文與著作，可參考者列舉以為備異，有謬誤處則嘗試釐清，以便在繁多、龐大、複雜的資料中，重新審定正確、仔細的論點，如此方能使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得以完整、真實地展現全貌，而不淪於因襲眾說、一知半解的困境，陷入閱讀《三國志》所產生既清楚又模糊的尷尬印象裡。

第二節 研究步驟與範疇

此既以裴松之《三國志注》為主要研究對象，故必以裴松之本人，及其《三國志注》為主，先以介紹，再漸次詳論其中蘊含的史學思想、方法，從而獲得裴松之《三國志注》的真實面貌，於後分別章節漸次探討，略論如下：

一、《三國志注》的作者

裴松之受詔為《三國志》作注，注成，此後研究陳壽《三國志》者，必以裴松之之注相輔，壽書、裴注，可謂並行於世，然而不論《宋書》或《南史》，其本傳內容皆過於簡略，因此，在介紹裴松之之生平事蹟時，先以《宋書·卷六十四·裴松之傳》與《南史·卷三十三·裴松之傳》的記載為主，並參之《晉書》、《梁書》、《隋書》等相關資料，分別詳述裴松之之生平與著作。

在裴松之之生平部分，可分成「氏族」、「事蹟」二方面敘述，先依相關史書記載，排出其「氏族」表，再以《宋書·卷六十四·裴松之傳》為本，敘述其生平經歷，輔以《宋書·卷二·武帝本紀中》、《二十史朔閏表》與《歷代紀事年表》增補介紹裴松之之「事蹟」，以方便能有更詳盡的了解。

至於裴松之之著作部分，亦可根據《宋書》本傳、《梁書》、《史記》、《後漢書》、《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史書記載，以及其他書籍的引用、補充，加以重新整理，得知現存能考的裴松之著作約有十數種之多，除聞名的《三國志注》外，尚有範圍涵蓋經、史、子的作品，按此順序一一列舉，並連帶查考其作品於各朝史書中的收錄記載，以確定其存佚情形，從而知悉裴松之所有著作於今之保存狀況。

二、《三國志注》的成書

宋文帝嫌陳壽《三國志》過於簡略，故下詔命裴松之補注，然今僅知《三國志注》完成於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註5〕，松之時年五十八歲，卻未知裴氏作注的真正時間，若依〈上三國志注表〉中所稱「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註6〕，可知《三國志注》應是在一年或將近一年的時間內完成的，在這麼

〔註5〕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民國74年11月3刷），頁2525。

〔註6〕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七》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同前註。

短的時間裡要完成繁重的作注工程，必有待助手共同編修〔註7〕。

因此，欲透徹《三國志注》的成書經過，就必須先確立「撰作動機」與「編寫過程」兩大主題的探究，裴松之作注的動機，原本是建立在因陳壽《三國志》「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註8〕的基礎上，故針對《三國志》的簡略、闕漏處，裴松之特別進行補強動作，而在編寫的過程間，裴松之主持總成，發凡起例，亦即先訂出體例，分別派使助手編寫、纂輯，最終再由裴松之作全書的考訂，終於在宋文帝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時完成注《三國志》的工程。

裴松之作注，本是起因於陳壽《三國志》「失在於略」且「時有所脫漏」而發為增補，故兩者無論在形式、內容上，都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繫，所以歷來學者亦多把兩者並列以為比較，於此將先從「與陳壽原書的比較」著手，進行字數統計，得出《三國志注》對陳壽《三國志》的增補作用，再緊扣住「補陳壽原書的缺佚」、「辨陳壽原書的訛疑」二方面，來探討陳壽本文與裴松之注文之間，存在的互補與對等關係。

有關陳壽《三國志》本文與裴注之間字數的多寡，前多承襲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說法，以為裴松之作注，「博采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註9〕，而後雖有王庭洽、崔曙庭、黃大受三家逐字計數以為求證，然為求更詳盡的資料以供仔細比對，故仍將根據鼎文書局出版的新校標點本《三國志》，分別對陳壽《三國志》本文，以及裴松之《三國志注》的注文逐字計數，進行統計後得出每卷字數與全書總計字數，再以字數、段數的統計分類並舉，按魏、蜀、吳三志依序編排，羅列出各卷次、篇目的字數、段落數，以求得本文與注文之間相互比對的結果。

三、《三國志注》體例研究

在確定《三國志》本文與注文的實際字數，且經過對比之後，必須更進一步了解在歷史事件記載上的詳略程度，意即從「形式」的參照，再深入到「內容」的探討，憑藉著《三國志注》「增補簡略」的作用，同時擴及「增補脫漏」的研究，並從中得知陳壽《三國志》原書病在簡略的原因，以及後代史學家批駁裴松之注「煩蕪」

〔註7〕 遼耀東〈裴松之《三國志注》的自注〉亦以為「《三國志注》可能是由裴松之主持，在大批助手協助下進行的」遼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9年2月初版），頁369。

〔註8〕 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七》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同註5，頁2525。

〔註9〕 見《郡齋讀書志·卷二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7年1月臺一版），頁101。

〔註10〕的理由。

據此展開裴松之《三國志注》的「體例」研究，主要內容即裴松之於〈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言「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鈔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註11〕，故可歸納訂出「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種體例，其中「補闕」、「備異」屬於材料的補述，此類注釋形式在裴松之《三國志注》中佔大多數，而「懲妄」、「論辯」則是對材料的考證與批評，即裴松之透過校勘、核驗材料後，提出個人對史事的議論，以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這一部份比重雖不多，卻是整部《三國志注》的精旨深義所在，因為透過其自注方式，不僅可以體現裴氏對魏晉史學所展出的批評性觀點，亦同時能夠發現松之史評在中國史學研究上，扮演著開闢史學批評先驅的重要角色。

四、《三國志注》引書研究

關於裴松之注《三國志》所引用的書目，清代錢大昕《廿二史攷異》、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趙翼《廿二史劄記》、趙紹祖《讀書偶記》、沈家本古書目四種之一《三國志裴注所引書目》，與民國王祖彝《三國志裴注引用書目》、王念祖《三國志裴注引書目》，以及王鍾翰發表於《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五卷的〈三國志裴注考證〉等，都曾對此做過整理、編輯的工作，但因依據的方法，以及分類的角度並不相同，所以也各有程度不一的謬誤與遺漏，且各家分類皆僅列魏晉時代的史學著作，而未含群經諸子、前文方言等援用材料，故猶有不全之憾，若不只限定於魏晉時代的史料，意即包含魏晉以前的經傳、文章，則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引書更有兩百五十部以上〔註12〕，因此首以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引用先後為順序，大致分成四類，即「作者、書名皆具」、「作者雖不書，猶知其著」、「作者未明，僅具書名」，以及「單篇詩文」，最後補以「評論者之言」的諸家史評，合為五類，藉以探討裴松之注《三國志》在材料的援引運用，和史籍的保存處理上，具有的非凡貢獻與永恆價值。

〔註10〕《史通·卷五·補注第十七》：「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民國67年10月臺一版），頁132。

〔註11〕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七》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同註5，頁2525。

〔註12〕此實包含二百三十二部引用著作以及單篇詩文二十一篇的總和。

裴松之作注引書頗豐，然今多散佚不存，若以唐代魏徵所撰之《隋書·經籍志》為主，輔以後晉劉昫的《舊唐書·經籍志》和宋朝歐陽修、宋祁共編的《新唐書·藝文志》，與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史料、著作共計二百三十二部互相核驗、彼此參照，依此即可推知裴注引書在隋、唐、宋時的存佚情況，最後，再參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記載，一併考察各類材料的作者、卷數、著錄與存佚狀況，藉以窺其現今藏書面貌的完整程度。

釐清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史料、著作計二百三十二部的作者、卷數、著錄與存佚狀況後，於第五章第二節作「引用書目索引」，此部份先前已有民國王祖彝所撰的《三國志裴注引用書目》一卷本，然其中多有錯置、不足，故以此為底本，重新編排「裴注引用書目」，並對王祖彝《三國志裴注引用書目》的闕漏與謬誤處加以補充、考訂，冀全「引用書目索引」之內容，以備後人閱讀《三國志》及其注時，可依「索引」迅速查考到所要找的資料。

五、《三國志注》史評研究

裴松之注《三國志》體例有四，即「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其中「補闕」、「備異」是裴松之及其助手共同纂輯完成，「懲妄」、「論辯」則是裴松之經過彙整引用材料的核驗與分析後，針對史事的議論、歷史人物的臧否，提出個人的見解，此即裴松之的「自注」。

其「自注」方式，大致而言，可分為「臣松之以為」、「臣松之案」、「臣松之按」，以及「臣松之」〔註13〕四種類型表示，不同展現方式代表撰作體例、思考意義的不同，藉此對陳壽《三國志》與所引相關材料進行各種驗證和批判，並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提出個人觀點，因此，《三國志注》的史評研究，首先必須就針對裴松之自注部分解釋，探討其於評論中展現的史觀與史識。

不過，《三國志注》並非只有裴松之的自注，裴松之於評論之際，尚須與陳壽史評相對照，以及羅列包括孫盛、何休、鄭玄、服虔、應劭、習鑿齒、華嶠、魚豢、袁宏、徐眾、高堂隆、張璠、干寶、孫綽等十四家史評，因此，探討《三國志注》的史評也不能忽略陳壽史評與此十四家之言，且裴松之於徵引此十四家史論時，亦多有所評述，故釐清裴氏援引其他史家的用意，以及比較各家與松之史觀的異同，當是《三國志注》史評研究的重要課題。

〔註13〕「臣松之以為」、「臣松之案」、「臣松之按」是裴松之最常使用的三類自注方式，餘則均歸在「臣松之」一類，後多接「檢」、「訊」、「從」、「曰」、「云」等動作描述。

六、《三國志注》的價值與影響

《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四史」，被譽為是中國古代紀傳體史書的代表作，其質量、成就遠遠超過同時代三國史的其他撰作，陳壽《三國志》真切因應三國鼎立的歷史特點，開創出新的史書體例，而裴松之站在陳壽的基礎上，增補其內容、修正其缺失，重要性絕不下於《三國志》本文，故於此探討裴松之《三國志注》的成就，除開與陳壽《三國志》之間相互依附的關係外，還可從其本身的「價值」、「影響」兩方面著手。

為史書作注，始於東漢服虔、應劭注《漢書》，到了魏晉南北朝，史注有了重大發展，裴松之當時注《三國志》，竟不依循注家正體，即重點不放在解釋疑難原文的文字訓詁上，而採取增補史實的變體方式，針對《三國志》的不足處努力克服，添加內容、考證紕繆，因此，裴松之在豐富原書記載的同時，往往援引大量原文，這使得《三國志》的注文，直接保存著古代完整的史料，尤其是三國時期的歷史素材。

不過，裴松之注的真正價值非僅止於此，在「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種體例下，「懲妄」、「論辯」的自注形式，才是裴松之心中理想的作注方法，因此，裴松之注不只是增補陳壽《三國志》的闕佚而已，對於魏晉史學更作了批判性的總結，為中國史學評論開創新途徑，雖然在裴注之前，漢代班彪等人也有所謂史學批評〔註14〕，但仍不夠具體，而裴松之不僅運用史注變體的新體例，也成為魏晉史學脫離經學獨立過程中的重要關鍵，及至後世史學家，包括劉勰《文心雕龍·史傳》，和劉知幾《史通》的史學批評，都受到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先驅作用影響，這一部份才是裴松之《三國志注》的真正價值所在。

三國、魏、晉當朝的史書、史料今多有散軼，陳壽《三國志》與裴松之注同列正史存於後世，足見其價值與影響層面的廣大，《三國志》雖然行文雅潔、意旨淡遠，惜內容過於簡略，必待裴松之注方能彌補其缺失，儘管在注釋、補充之後，二書的闕漏仍然不少，但陳書、裴注在中國史學史上代表的意義非凡，陳壽將《三國志》分成〈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承襲司馬遷《史記》的通史體，以及班固《漢書》的斷代史體，在斷代史中另創一格，而裴松之替《三國志》作注，旨在增補陳壽原書記載的不足，裴松之重視歷史真實面的書

〔註14〕《春秋左氏傳》早有假稱「君子」的發論，《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則分謂「公羊子」與「穀梁子」，不過，春秋三傳均非每篇都有論的抒發，每篇必有論者，應始於司馬遷《史記》，《史記》明云「太史公」，「太史公」即司馬遷本人，到了班固《漢書》時，又改曰「贊」，其後又有「序」、「詮」、「議」、「述」等的不同，然史書紀傳跋尾應當正名為「史論」，不當云「贊」，而「史論」的名稱，到陳壽時改稱為「史評」。

寫，因此徵引許多不同來源的材料作為參考，隋唐以後，史籍散軼程度嚴重，幸賴裴注徵引的內容得以保存。

不過，《三國志注》的真正價值非僅於保存魏晉史料，而是議論材料、考證本文、臧否人物、評斷史事的裴松之自注，裴松之的自注不但總結了魏晉史學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史學批評開創新路，成為劉知幾等後世史評家的先行者，因此，欲研究裴松之《三國志注》在中國史學上的貢獻與地位，絕不能只著眼在裴注與陳壽原書之間的補充、考辨作用，必須全面性地歸納裴松之《三國志注》和陳壽本文之間，以及與所徵引的魏晉材料之間的縱向、橫向連結點，並獨立思考裴注本身展現的態度、書寫的脈絡、代表的意義、敘述的方式等不同切入角度，如此方能真正深入裴松之其人，以及《三國志注》其書的本質，並依循裴注撰作的動機，進一步探討所衍生的任何問題，找出可以依據的軌跡，為裴松之《三國志注》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價值確實定位。

第二章 《三國志注》的作者

第一節 裴松之的生平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山西省曲沃縣）人，《宋書·裴松之傳》僅言其太祖元嘉「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註1），未載生年，清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依此上推，以爲「松之當生于晉簡文帝咸安二年」（註2），可知裴松之係東晉簡文帝咸安二年（372）生，而於南朝劉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卒，享壽八十，其生平事蹟見於《宋書·卷六十四·裴松之傳》與《南史·卷三十三·裴松之傳》（註3），依記載可劃分成三方面來作介紹：

一、氏 族

祖 裴昧 光祿大夫

父 裴珪 正員外郎

舅 庾楷

子 裴駟 南中郎參軍

《宋書·卷六十四·裴松之傳》並未對裴氏家族有太多著墨，僅知裴松之屬河東聞喜裴氏，其祖裴昧、父裴珪名皆不顯，未見《晉書》、《宋書》立傳，上代世系亦無

〔註1〕見《宋書·卷六十四·裴松之傳》沈約撰：《宋書》（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4年6月臺一版），頁1701。

〔註2〕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廣文書局，民國60年5月再版），頁246。

〔註3〕見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民國74年3月四版），記載多與《宋書》本傳相同。